

解構的翻譯

Jane Gallop 著

王蕺真 譯

讓我引用德希達 (Derrida) 在〈播撒〉(“La Dissémination”) 中的一段話做為本文的開始。

文本……從那個入侵它的文字 (graphy) 中吸取了一種不同的力量……這個文字從鏡子的另一面而來……在尚未出現前就已將自己翻譯進後者 (文本)……。它活躍的翻譯 (active translation) 已被秘密地播撒；長久以來，它已在暗中慢慢地挖掘鑿空……你的 (自) 家文本 (domestic text)¹

我之所以用上述引言做為本篇論文的開始主要是因為引言中「活躍的翻譯」這句話。我想借用德希達這句話去試著思考、歸納出一些也許我們可以稱之為「活躍的翻譯」的想法。

在〈播撒〉中，德希達兩度使用「翻譯」一詞來說明漢字如何穿梭在菲利浦·索雷 (Phillipe Sollers) 的小說《數字》(Nombres) 的文本中。首先，做為反身動詞 (reflexive verb)：外來的書寫「翻譯自己」。它不僅是被翻譯的對象，它亦是翻譯的執行者 (agent)，因此，它並不是消極地遭受翻譯。「活躍的翻譯」在此意味著入侵

(invasion)的觀念，是一種從某外積極主動向某內進入的一種行動。入侵者不僅是從外而來，它更是「從鏡子之外」而來，是從某個尚未被「他者化」(othered)而淪為鏡象——一個確實無誤的原物反面——之外的空間而來。

「播撒」的觀念不但性意識化且性別化了「入侵」的行為。「活躍」(active)一詞涵蘊了男性：女性，主動：被動，一種我稱之為「規範式的男性異性性意識」(normative male hetero-sexuality)的架構。這種入侵與播撒的「情景」(scenario)是相當隱密的：它是一種隱藏式的運作，就好像是隱密的外國間諜滲透到某個內在的空間。

被這個祕密行動所入侵之處是和「domestic」這個形容詞連繫一起的。「domestic」這個字具有兩層意義。²第一層意義是指國內的（以別於國外的／外國的(foreign)的)；第二層意義則是指傳統上被視為屬於女性的家的空間。在「播撒」(受精)的行為中，這個「(自)家文本」(domestic text)亦可被視為子宮。我們或許可以用「家」(home)一詞做為本鄉(homeland)(當「domestic」意為「非外國的」(non-foreign))和子宮之間的一個中介詞。

我對德希達的「活躍的翻譯」所帶來的諸多聯想感到不安，而其中最令我不安的一就如你可能會想像到的，或是你應該想到的一即是侵略式的播撒。但是不論如何，我仍要藉著並且使用「活躍的翻譯」這個觀念來繼續我的討論。

*

*

*

事實上，我發現將德希達的翻譯觀念解說的最有趣的不是德希達本人而是菲利浦·路易士(Philip Lewis)。路易士的論文〈翻

譯效果的探測》(“The Measure of Translation Effect”)收錄在《翻譯中的差異》(Difference in Translation)這本以解構角度來討論翻譯的論文集之中。在這本書裡有一半的作者都曾將德希達的作品從法文翻譯成英文。³雖然路易士並設沒有翻譯過德希達的著作，但在象徵性的層面上，他也許可以被稱為是德希達的翻譯者(the translator of Derrida)。路易士這篇論文原來的題目為〈論暴逆的翻譯〉(“Toward Abusive Translation”)。⁴「暴逆的翻譯」把活躍的翻譯中之主動性及侵略性更加推進了一步。在此，我所試著建構的翻譯理念不但可以被稱為「活躍的」，還可以說是「暴逆的」(abusive)。

德希達宣稱一個「好的」翻譯一定要執行暴逆……翻譯者的目的是要以類比的方式重新表達(rearticulate)原文本中的「暴逆」(abuse)，並運用這個力量使得暴逆不僅出現在原先所屬之處同時也被移位、再次啟動，並且延展到另一個不同的環境中。在那裏，暴逆將會有雙重功能——一方面它會對其所依存的語言及觀念體系產生強力的衝擊，另一方面，它又會將其批判回刺導入其所翻譯之原文本中。因此，就暴逆的翻譯和原文本之間的關係來說，暴逆的翻譯就變成原文本的一個不安／定的結果(unsettling aftermath)。(彷彿翻譯想佔據原文本原已不安／定的家，如此翻譯不但遠不能內馴(domestication)原文本，反而會將原文本帶到一個更加異於(foreign)本身的地方)。(39.43)

路易士先引法文，然後再引英文，在這種方式運作之下，他從德希達的原文中引出了「暴逆的翻譯」這個觀念。德希達雖然

把暴逆和翻譯連在一起，但他並沒使用「暴逆的翻譯」這個詞語，因此「暴逆的翻譯」可以說是路易士對德希達的「翻譯」。

路易士和德希達一樣嘗試為這個非常負面的字重新定位並賦予新的意義。「暴逆」很少被用來描述正面的事物，但是在此，「暴逆」和力量（force）這個觀念結合而成為虛弱與無能的反義；如此，暴逆就蘊涵了正面的意義。然而當暴逆做為虛弱、無能的反義時，人們會很容易將其與性別規範（normative gendering）聯想在一起。

路易士為暴逆的翻譯運作的方式做了如下的解釋。首先，我們必須假設在原文本中已有暴逆的存在；一個真正純潔（innocent）的原文本其實不會有遭受「暴逆」的可能。路易士所謂的原文本，是特指那些不以使用暴逆語言為恥的解構文本（deconstructive texts）。翻譯者會把德希達對法文所做的暴逆以類似的方式再度展現在對英文的暴逆之中。

原文本暴逆自己所處的處所（habitat），翻譯則帶著這個暴逆而出走。當翻譯到達了一個新的地方時，它會產生兩個功能。暴逆的翻譯的第一個工作就是「對其所依存的語言……系統產生強力的衝擊。」暴逆不僅是一種力量，它同時也是一種作用過程（forcing）。我認為入侵及播撒其實就是一個和作用過程有關的整體網路。另外，會對原處所產生作用力及暴逆行為的其實全是原處所的「依存者」（dependent）——這個現象使我聯想到一個特別暴力的青少年。

翻譯的文本就如同原文本一樣也會暴逆它所依存的語言及觀念的系統，德希達作品的英譯應該會把英文推至其極限；很明顯的，除非是「用英文」，要不然上述的現象就不會發生。如果我們遵從正確的英文語法來翻譯德希達，德希達原文中的暴逆現象就無法翻譯出來。因此在英文版的德希達文本中，我們會發現許多

新字詞(neologism)，以及一些奇怪的話語。如果你曾讀過英譯的德希達文本，你就會了解我的意思；當然，如果你閱讀的是別種語言版本的德希達文本，你多少也可以對我這句話有些體認。

在就語言作用力(forcing)來說，暴逆的翻譯其運作的方式類似於暴逆的原文本。但是路易士認為暴逆的翻譯是有「雙重功能」。我對路易士所說的第二個功能很有興趣，因為它和性別有關：「另一方面，它又會將其批判的回刺導入(thrust)其所翻譯之原文本。因此，就暴逆的翻譯和原文本之間的關係來說，暴逆的翻譯就變成原文本的一個不安／定的結果。」刺入(thrust)這個字是作用力、入侵及播撒這整個網路中的一份子，這個意象在路易士的論文中佔了一個很重要的位置。關於此點，我想不用再說太多，並且我已厭倦討論這個問題，因此就在此暫時打住。

只有第二個功能才可以使翻譯成為真正暴逆的翻譯：這就是說翻譯不僅只是翻譯暴逆的文本而已，翻譯本身亦有暴逆的力量。在這個觀念出現之前，我們對翻譯都抱持著很傳統的想法：那就是我們必須把存在原文本中的能量(force)帶到別的地方去。但是就從「另一方面」這句話開始，路易士把我們由翻譯解構(a translation of deconstruction)帶到了一個我稱為解構的翻譯(deconstructive translation)的領域。當翻譯「成為一種不安／定的結果」時，它已影響了原文本。

「不安／定」(unsettling)的意象是家(home)與移置(displacement)意象群中的一部份。在此，最令我感興趣的想法是翻譯不再為對原文本的忠實複製。路易士所說翻譯的第一個功能是在忠實傳達原文本中的強大(violent)能量，但是翻譯的第二個功能卻是要對原文本使用暴力。

在陳述完暴逆的翻譯理論之後，路易士在其論文的後半部批判了一篇正式出版的譯文，指出譯者將德希達的文本翻譯成英文

後，原文本中暴逆的能量已蕩然無存。令人有些驚訝的是，路易士在運用理論分析作品時竟也只是以一種傳統的方式哀嘆法文原文本中的能量喪失不見而已。路易士對暴逆的翻譯的另一層面並未著墨——我將其稱為暴逆翻譯「本身」(proper)，這即是說，翻譯本身就是暴逆的，暴逆的翻譯不是翻譯暴逆(a translation of abuse)。路易士將這個問題排除在它的討論之外。他似乎特別著迷於德希達的暴逆力量，所以只著重於討論譯文是如何失掉了這個力量，然而對我而言，探討如何可能去暴逆德希達則是有趣多了。

我之所以引用路易士的話是因為路易士建構了一個我稱為「暴逆的翻譯」理念。這個理念很清楚的出現在路易士論文結尾的括號部分：「(彷彿翻譯想佔據原文本原已不安／定的家，如此翻譯不但遠不能內馴(domesticating)原文本，反而會將原文本帶到一個更加異於本身的地方)。」

如果真有所謂純淨的家，如果原文本中沒有任何異於其本身的物質，那麼解構也無從產生。翻譯並不是在內馴原文本，而是使原文本中的異質更加的異化。在這點上，翻譯是非常積極主動的，它不但回到了原文本的家並且更進一步的佔領它。路易士所用的佔領意象和德希達的入侵相當類似。雖然兩者在性意識上並不同調，但是兩者都有地緣政治學(geopolitical)的意涵。

像這樣經常地稱許異質的、外國的(foreign)，卻貶抑內在的、家庭的(domestic)的討論令我非常震驚。在如此的想法下，很明顯的，對於家你所應該做的就是去顛覆(unsettle)它，使它成為不是家(not-home)。內馴化／家庭化(domesticating)這個動詞帶著「內在、家庭」這個字最負面的意涵。在這裡，我們有一套價值系統認為異質與不安定是好的，而內馴、家庭則是壞的。我想這套價值系統或許可以被稱為「迷外意識」(exoticism)，或者「逆向的種

族中心主義」(reverse ethnocentrism)。

在大家都貶抑內馴的背景之下，家庭成為一個不為人所愛之物的時候，我倒很想來評估女人的工作並探討是哪些必要的狀況使某些人做一些傳統上女人所做的事，即使做這些事的人，不一定是女性。對於家為何物，我真的感到迷惘：家就是一個會使人們被家的意識型態所窒息的地方，但是我也有一種需要在安定的家生活的感覺，即使這個家只有最起碼的安定性。這樣的想法是一種愚笨的二元化思考。當我們認為家是壞的而攻擊它時，我們忘了我們仍是依賴著家提供食物及居所。我們也必須思考「家」與「無家」(homeless)之間的關係；當我們開始討論「顛覆」(unsettling)家的時候，我們可能會想到在現實生活中的確有無法安定下來的人。雖然我們有讚頌流浪者的歷史，但是我並不想把「無家」頌揚為自由的空間。

懷舊之情與家庭意識一直深植在我心中，但身為女人，我也時常感受到家令我身陷其中而不能一展所長。可是我寧願把上述兩種想法都視為家的一部份，而不願以一種非／即(either/or)，也就是以種族中心主義或逆向種族中心主義的二元思考來處理「家」的問題：這也就是說你要不就捍衛家園不為外者所侵，不然你就逃出家庭成為無家的流浪者。然而這樣似乎不是一種有創造性的思考方式。

十年前在一場研討會中路易士試著建構解構的翻譯(deconstructive translation)理念。有幾位德希達的英譯者也參與討論翻譯與解構的問題，⁵但是最知名的一位譯者並未出席。十年前，史碧娃克(Spivak)也同樣的討論翻譯與解構，然而她卻要我們以性別的角度來思考翻譯與解構。

《批評探究》期刊(Critical Inquiry)曾出版一期頗具影響力的女性主義專集，並以史碧娃克為孟加拉小說家瑪哈史薇塔·戴薇

⁶(Mahasweta Devi)的小說《卓帕第》(Draupadi)所寫的前言及翻譯做為壓軸之作。不知道是出自史碧娃克的要求，還是期刊主編的安排，從目錄上看來，史碧娃克竟好像變成了這個小說的作者。他們之所以這樣做，或許是因為創作小說不適合出現在學術評論期刊中，或許是因為這是一本美國學術期刊，或者是因為在美國學術界中史碧娃克已相當有名氣但無人知道戴薇是什麼人……。不論如何，從路易士所說的地緣政治學的角度來看，我們也許可以說翻譯者已「佔領」(occupy)了作者的地位。

史碧娃克在她1987年出版的書《在其他的世界中》⁷(In Other Worlds)收錄了上述的前言及翻譯做為書中的第十一章。史碧娃克把翻譯的小說放在自己所寫的書中，同樣地再次突顯了作者是誰的問題。也許有些人會認為雖然第十一章〈卓帕第〉是由史碧娃克的翻譯及前言所組成，但是前言比小說還要長，所以第十一章可以被視為史碧娃克所寫的評論的一部份。但是這樣的說法卻無法用在第十三章。因為第十三章只是單純的由史碧娃克所翻譯戴薇的另一個故事〈給乳房的人〉(Breast-Giver)所構成，其中並沒有前言。第十四章才是有關〈給乳房的人〉的評論。因此，我們發現「史碧娃克的書」至少有一章是別人所寫的故事，史碧娃克只是故事的翻譯者而已。

*

*

*

史碧娃克在《論文字寫作學》(Of Grammatology)的序文中指出德希達和她都有雙語的背景(bilingual)，但是德希達的英文比她的法文好一些。史碧娃克試著糾正我們以為她的翻譯只是從法文中拿些東西出來然後帶到英文裡去的看法；她為我們揭出一個不同的方向去思考翻譯，此即，翻譯可以從一個已是雙語的文本進

入到另一個雙語文本中。

我認為史碧娃克在這裡對翻譯的討論比她在《卓帕第》中更加成功。她認為英文以及翻譯在德希達的原文本中早已產生作用。英文和翻譯都和壓制的政府當局相連在一起：政府的御用學者試著把部落語言(tribal language)詮釋為反制叛亂的工具，而英文字詞則是一種軍事論述(military discourse)。史碧娃克也論及女主角如何在完全不懂英文的狀況下，竟然於故事結束時能夠正確地使用了一個英文字。

史碧娃克以乎在闡述翻譯的另一個觀念：翻譯並不是把英文之外的文本帶進英文去，而是在探討英文和翻譯是以何種方式在原文被翻譯之前就已經很政治地在原文本中運作了。

我之所以轉而討論史碧娃克是想從理論的架構談到實際的例子；我想將史碧娃克所翻譯的《論文字寫作學》做為活躍翻譯的例子。史碧娃克在《論文字寫作學》譯者序的最後部份談到翻譯以及翻譯和解構的關係。⁸ 史碧娃克提出了一個翻譯的解構理論(the deconstructive theory of translation)：

德希達把「錯譯」(mistranslation)做為一個有效的解構槓桿……最顯明的例子是德希達很恰當地質疑為甚麼譯者在翻譯〈柏拉圖的毒藥〉(La pharmacie de Platon)時，棄毒/藥(pharmakon)這個字不用而以一群不同的字做為替補？⁹

〈柏拉圖的毒藥〉是德希達閱讀《費德拉斯》(Phaedrus)的感想，史碧娃克並沒有翻譯這篇文章。德希達在〈柏〉文中討論「pharmakon」這個字具有許多相互矛盾的意義。¹⁰ 但是德希達發現這些矛盾意義的「戲耍」(play)竟在翻譯中消失殆盡。德希

達在這裏所運用的觀念——也就是史碧娃克所謂的「解構槓桿」——在我看來其實是對翻譯做傳統的了解，似乎不是一個相當解構的翻譯思考：德希達為那些被譯者所棄的意義感到哀傷，並試著帶我們回到原本去。

從史碧娃克使用「恰當地」(appropriately)以及「替補」(substitute)這兩個字來看，史碧娃克似乎對德希達在翻譯上的保守態度有著微妙的理解。史碧娃克用「恰當地」三個字有點奇怪。而「替補」則與《論文字寫作學》中的「替補的邏輯」(logic of the supplement)論述相呼應。替補應是出現在原本本之後的次要附加物(secondary addition)，但實際上，它卻越俎代庖取代了原本本的位置。我們前面所討論的活躍的翻譯就是分毫不差地產生出一個「翻譯替補」(translated substitute)，它佔據了原本本的家。

不論史碧娃克在談到「恰當地」及「替補」這一段中的語氣及立場為何，但是下一段的論述卻令人有些錯愕。不過我倒是很喜歡這一段。史碧娃克以一種非常直接的態度傳達德希達視錯譯(mistranslation)為解構槓桿的說法。史碧娃克說：

總之，我所期待的讀者應該緊抓住我的錯譯，並且利用這個槓桿解構德希達的文本，並使其超越在文本中做為控制主體的德希達。(1xxxviii)

上述的討論出現在譯者序的最後。起初史碧娃克似乎在說：希望我的讀者以德希達讀柏拉圖譯文的方式來讀我的譯文。而我則期待史碧娃克繼續說：我理想中的讀者，他能夠緊抓住我的錯譯，返回到原本本的能量(force)所在，並糾正我的錯誤。我期待看到譯者經常會表現出來的謙遜態度：我很抱歉，希望讀者能

指正並補充我的不足。我們可以看得到德希達在閱讀柏拉圖時表現出這樣謙遜的態度。然而史碧娃克下一個句子卻令人震驚。

我並不是對「一個緊抓住我錯譯的讀者」這個意像感到震驚；想像一下，讀者可能會說：「哈！你翻錯了。」這樣的反應其實和我的經驗一致。去年我開了一門翻譯解構的研討課，我們謹守「緊抓住史碧娃克的錯譯」這個原則——批評她用字的選擇，並且建議更貼近原文的字詞——我們也一直在對這樣的策略(politics)作思考。然而史碧娃克的理想讀者是會「緊抓住〔她〕的錯譯」，但不會批評她與原文本相距有多遠，反而會「解構德希達的文本，並使其超越在文本中做為控制主體的德希達。」

在這一段的第一句話裡已經有一個角色倒置(role-reversal)的想像。史碧娃克期待「這種讀者」，其實她是在期待像德希達這般的讀者，或是德希達本人來做為她的讀者。史碧娃克曾說過她的翻譯是她對德希達的解讀(reading)。我們可能會感到這是史碧娃克的願望，希望德希達做她的讀者更甚於她自己做為德希達的讀者。其實上述這種繁複的解釋並不是太必要的，因為就以最直接的方式來解讀這一段的最後一句話就可以讓我們看到譯者對原文本的叛變(coup)。

史碧娃克的理想讀者會發現到她的「錯譯」，但是不會認為「她應該以比較接近德希達的說法來呈現譯文」。這種讀者寧願守住史碧娃克的「錯譯」(「緊抓住它」，不是把它抓出來，而是緊抓不放)，認為「這就是文本所在，也就是我要的文本，而不是由德希達所主控的那一個文本。」讀者寧願跟隨著被史碧娃克移置的文本而不願試著把翻譯文本帶回家以找出德希達。史碧娃克譯者序的最後一段是活躍的翻譯及暴逆的翻譯的精采聲明。在此刻，她不僅是一位翻譯解構者(a translator of deconstruction)，她亦是一位解構翻譯者(a deconstructive translator)。

當我讀德希達的〈柏拉圖的毒藥〉時，我覺得好像在看翻譯家的笑話。翻譯家是個最容易被攻擊的目標，因為翻譯其實是一個不可能的任務，而且在翻譯的過程中許多沒有被譯出的細節一直會被別人挑起。此外，翻譯是一種極端順從的行為。首先，它必須被原文所約束。第二，它又必須接受大眾的羞辱。我想就是因為如此，所以有關譯者報復的想法才特別具有吸引力：它可以讓總是處於劣勢的譯者有翻身的機會。

我對研究史碧娃克如何解讀德希達的《論文字寫作學》感到莫大的興趣。一部份的原因是因為在1990年代我對史碧娃克比對德希達更感興趣，我開始把《論文字寫作學》當作史碧娃克而不是德希達的文本來閱讀。

我試著從譯者序的蛛絲馬跡中尋找我自《論文字寫作學》以及史碧娃克其他作品中所認識的史碧娃克。我找到了一點並且緊抓不放。它為我開創了一個對《論文字寫作學》全然不同的讀法。但是在我試著把這本書當作史碧娃克的文本之前，我一直是將其視為德希達的作品。而且我常常會對一件事感到很困擾：為什麼史碧娃克的翻譯和我所可能做出來的翻譯竟然會截然不同？我想這個現象意味著我試著把《論文字寫作學》解讀為我自己的書。當然，這又是另外一個議題。

下面的這段話出現在史碧娃克的譯者序中，它為我塑造出一套閱讀方法：

地理圖式(pattern)的影子……籠罩在本書的第一部份。邏各斯中心主義論(logocentrism)和種族中心主義論的關係間接地在第一個句子中被喚起……。但是，很弔詭地，幾乎是以一種逆向的種族中心主義論的態度，德希達堅持邏多斯(logos)是西方(the West)的產物(property)。他

經常陳述這個想法，所以任何的引言在此都是多餘的。雖然一些有關中文對西方的偏見曾在第一部份被討論過，但是東方(the East)在德希達的文本中並沒有被認真地研究或討論過，那麼為什麼東方仍舊必須擔負起文本知識極限之名？(lxxxii)

在《論文字寫作學》中壞人(the bad guy)被稱為邏各斯中心主義，德希達在第一頁中說得很清楚，邏各斯中心主義論不僅是一種種族中心主義，而且是「最具原創性(original)且最強有力」的一種種族中心主義。我第一次讀這本書是在 1970 年代初期，我可以感覺到邏各斯中心主義因為和種族中心主義的關連而遭到極具政治意味的攻擊；那個時候，我雖然沒有聽過邏各斯中心主義，但是我知道種族中心主義是我要對抗的一種想法，因此，我最好把邏各斯中心主義弄清楚：「我的天，這是最壞的一種！」這就是出現在第一個句子裡而且會把讀者帶入全書的話。

史碧娃克在譯者序中所說的「幾乎以一個逆向的種族中心主義」應是她對德希達最嚴厲的批判。它雖然很謹慎地用「幾乎」(almost)這個詞，但是這個小心謹慎的「幾乎」其實就是史碧娃克批判德希達的象徵符號。在此「幾乎」暗示著德希達的想法可能就是逆向種族中心主義，但是史碧娃克又不能證明，或者因為她不想明講出來，所以就以「幾乎」兩字帶過。但是，實際上史碧娃克是在指控德希達的逆向種族中心主義。

緊接著這段敘述之後，史碧娃克繼續說：

第二部分對李維史陀(Levi-Strauss)的討論是全書僅見的，真正強烈的批判，而且也可能是全書在形式上來說最不彀扭的一部份……。德希達強烈地抨擊李維史陀濫

情式的種族中心主義，……這位人類學家用他的逆向種族中心主義擁抱「沒有文字的天真純樸的族群。」(lxxxiii)

《論文字寫作學》是由兩部分所組成(理論與實例)；第二部分主要是以研究盧梭(Rousseau)為主，但是德希達卻以討論李維史陀做為啟始。我們可以大略地說德希達在這章中主要是在揭露李維史陀的逆向種族中心主義。史碧娃克依序討論這兩個部分。她對德希達的逆向種族中心主義的指控出現在她對第一部份討論的最後一段。緊接著，沒有任何停頓，史碧娃克以上面的引言作為第二部分討論的開始。史碧娃克把自己對德希達逆向種族中心主義的質疑緊緊地和德希達對李維史陀的逆向種族中心主義的批評連接在一起。

在第一部份，史碧娃克所謂的「西方對中國的偏見」是指德希達討論中文書寫於十七、十八世紀時在歐洲思想(體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如果地理圖示的影子籠罩著《論文字寫作學》，那麼我們也會在中文書寫中讀出那個圖式：德希達的《論文字寫作學》(De la grammatologie)的封面是白色的；而《論文字寫作學》(Of Grammatology)則是以中文書寫做為封面。

為了讓自己有足夠的勇氣來批評這本書的封面，我試著將史碧娃克的《論文字寫作學》和她十年前所寫的一篇論文放在一起解讀。在這篇論文中，史碧娃克發現克莉斯蒂娃在《有關中國女人》(About Chinese Women)這本書中亦將西方對中國的偏見具體化(avatar)：「這種一廂情願的利用歷史……使得克莉斯蒂娃和十八世紀崇拜中國的人(Sinophiles)相去不遠……西方世界……提供給他們所訓練的第三世界女性主義者一個極端簡約化的中文書寫，而這種非常十八世紀的地方略覽式(topos)的認知卻又是克莉斯蒂娃所嘲諷譴責的。」¹¹ 在這篇1982年所寫的論文裡，史碧娃

克把克莉斯蒂娃放在一群法國理論家之列，而這些學者「都曾向外尋求不是西方所固有的東西，因為他們對千年以來受到西方世界所珍愛的西方形上學(Western metaphysics)產生質疑(136)。史碧娃克在列舉這些法國理論家時將德希達放在首位；當她再討論「西方形上學」這個被質疑的議題時，史碧娃克會更明確地將矛頭指向德希達。

在《論文字寫作學》中，德希達對中文書寫的看法主要出現在第一部份的最後。他說：

長久以來，我們知道中文或日文這種主要為非拼音的(nonphonetic)文字在很早以前就包含了一些語音的成分(phonetic elements)。中文和日文在結構上仍是以象形文字(ideogram)為主……因此我們就有了強大文明可以在所有一切(all)邏各斯中心主義之外發展成形的證明。¹²

在這本書中德希達經常提到「中文書寫」；現在他首次加上「或日文」。有很長的一段時間德希達都是在討論馬雅象形字(glyphs)以及復活島(Easter Island)上的文字。德希達在此跳出了十八世紀將中文書寫視為地方略覽(topos)式的思考，進而開始討論當代全世界的學者對書寫所做的研究。德希達不再討論中文書寫的歐洲意象，他開始正視西方之外的世界。

在此刻，當德希達開始注視西方以外的世界時，他寫到了所謂的「之外」(outside)：「在任何(any)一個邏各斯中心主義以外發展出的文明」。這句「在任何一個邏各斯中心主義之外」令我震驚。「任何一個」所含的絕對性(absoluteness)似乎是非常的極端，意指百分之百沒有一絲一毫的邏各斯中心主義存在。

我也緊抓住這個「之外」。走出邏各斯中心主義是這本書的重

點。我們經常讀到「邏各斯中心的（或形上學的）閉鎖」（logocentric(or metaphysical) closure）。這句話可以用來描述時間與空間，但主要還是以時間為主：我們必須要走出這個時代（epoch），走出形上學的歷史，同時，對邏各斯中心主義的負面評價也使我們渴望能逃出這個閉鎖。德希達讓我們很清楚的了解到想要輕而易舉地跳出一種很天真的想法，但是，當他在此遙望西方以外的世界時，他竟找到了一個存在於「在任何一個邏各斯中心主義以外」的桃花源。

德希達找到了一個明確的且絕對的和西方相對(opposite)的地方。這其實是很標準的逆向種族中心主義。他不喜歡他所居之處而想出走。這裏所擁有的特色，那裡一點也沒有。這個所謂另一個地方(another place)，也就是家的全然相反之處，其實就是標準的「他者」(Other)。

先前當我專注在討論美國與法國之不同時，我並沒有注意到他們與東方(the East)的關係。現在當後殖民論述影響到我們對文本的解讀時，再回頭看看一些寫於1960年代及70年代的法國文本，我們發現他們和中國以及日本的關係的確令人非常著迷。

這似乎就是我對「活躍的翻譯」的看法：從原文本被譯進的新環境背景的角度來重讀原文本。現在我是以一種很廣義的角度來討論「翻譯」：《論文字寫作學》是史碧娃克翻譯德希達的作品，就連《在其他的世界中》也可能被視為史碧娃克對德希達的翻譯。我發現《在其他的世界中》對德希達的《論文字寫作學》(De la grammatologie)很具影響力。這就是為什麼我願意試著了解菲力浦·路易士在括號中所寫的回到原文本而後使一個本來就已不安／定的原文本更加迷亂的意義。《在其他的世界中》令我看到了《論文字寫作學》他者化了東方。

*

*

*

在《在其他的世界中》的第十四章〈給乳房的人〉裏，史碧娃克考量應該用什麼政略(politics)將第三世界女性文本翻譯給第一世界的學術界；她表達了心中的不安也考慮到其中的危險與利益(253)。但據我所知，史碧娃克並沒有討論過如何將巴黎的男性文本翻譯給相同讀者的政略問題。我不是說這兩種政略是相同的；我對於兩者之間的關係很感興趣。我準備開始思考從孟加拉文翻譯成英文，以及從法文翻譯成英文的理論差異。

雖然我對史碧娃克將戴薇移置(displacement)感到不安或有點猶豫(就如同史碧娃克一樣)，但我對史碧娃克移置德希達卻覺得是件應該支持且令人欣喜的事。我好像把自己對翻譯與原本之間的那種愛恨交加的情緒投射在一個二元對立之上：對男人做這樣的事是好的，應該的，但對女人這樣做則是不好的。

我經常很困惑地發現許多有關翻譯的「解構的」(deconstructive)論文似乎都在運用一些相當「不(non-)解構的」翻譯概念來批評翻譯解構(the translations of deconstruction)；而更有甚者，這種現象有時候竟出現在自以為是以解構觀念來討論翻譯理論的論文之中。這種分裂(split)現象對我而言（我仍是以自己的方式複製(reproduce)這種分裂）似乎是一種愛恨交織的病狀，而人們無法誠實地跨越了這個障礙；至少就我而言是如此。

當我們在讚頌原本(the original)的失落時，我們似乎不認為有甚麼大不了，因為我們想要從哪裏了解文本就從哪裏了解；然而事實上，我們還是很在乎的。這樣的矛盾之情似乎是翻譯解構(translation of deconstruction)的討論當中很重要的一個現象。例如，十年來大家認為解構來到了美國所以才滲進了不少雜質。這種看法和上述的矛盾心態其實有異曲同工之妙。人們將解構置於其「原

始的背景環境中」(in its original context)來討論。在一個解構的環境中，哀嘆始源的失落似乎是一件很反諷的事，然而一般人卻經常這樣做。

在討論解構的翻譯時，人們常不可避免的自我矛盾：他們一邊讚揚解構的翻譯，而後又抱怨翻譯家都「濫用」德希達。就我的立場而言，我可以很輕鬆地說：「自我矛盾！你們不是要暴逆的翻譯嗎？那麼當他們在濫用/暴逆時，你們為什麼要這麼沮喪？」然而一個更誠實即使不安的關係應該不只僅是：「我們並不在乎始源」而是：「我們知道始源並不存在，但是我們真的很在意始源，然而我們對自己在始源的想法上也抱持存疑的態度。」這種既複雜又矛盾的關係，無可避免地一定會被兩極化。

我發現自己也在使用一些相對的名詞，如性別或「第一世界」對「第三世界」，而將翻譯兩極化。例如，我曾說：「我們必須尊重第三世界的女性文本，但是我們可以暴逆歐洲男性的文本。」雖然這聽起來不像是一個理論的立場，但我也不願意否認它的存在。翻譯也不會總以同樣的姿態出現；例如，在我們這個學術圈裏，翻譯歐洲文本的作用和翻譯亞洲文本是不同的。如果我們不願再見到自己不斷地讚頌我們愛恨交織的心理，或是陷在一個不自知的矛盾當中，一邊頌揚始源的失落，一邊又抱怨始源的消失，我們就必須談論一些更明確，更有策略性的東西(things)。例如，當(原)文本的權威(authority)對抗譯者的權威時，原文本的權威會有什麼改變？

例如，我們或許可以從美國學術圈中相對的文化權威性(relative cultural authority)這個角度來探討史碧娃克處理德希達以及史碧娃克處理戴薇之間的異同。在《論文字寫作學》出版後，史碧娃克被學術界公認為「德希達的翻譯者」，而相反的，戴薇在此間則被視為被史碧娃克翻譯的作家。美國學術界是因為史碧娃克才會去閱讀戴

薇的作品，但他們經由史碧娃克的翻譯閱讀德希達則是因為他們無法閱讀原（法）文。這兩者的關係顯然是不同的，但在我們對翻譯做理論性的思考時，上述的差異也應該被討論。

註釋

- ¹ Jacques Derrida, "La Dissémination," in *La Dissémination*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 1972), 396-7。由芭芭拉·強森 (Barbara Johnson) 翻譯成英文《播撒》(Dissemin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1), 356-7。
- ² 1992年4月在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的一場研討會中，布藍夏爾 (Marc Blanchard) 指出法文「domestique」並沒有，或在1969年時不曾含有英文「domestic」的「國家之內的」(internal to a country)，「非外國」(non-foreign) 的意義。然而在本篇論文中「domestique」確實有上述的意涵。我們可以說這是「活躍的翻譯」的一個例子：英譯想要傳達的意義甚至會在譯文出現前插入 (insert) 法文文本中。
- ³ Philip E. Lewis, "The Measure of Translation Effects," in *Difference in Translation*, ed. Joseph F. Graha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5), 31-62。德希達的譯者芭芭拉·強森，理查·藍德 (Richard Rand) 以及亞藍·巴斯 (Alan Bass) 也有論文收錄在這本選集中，德希達所寫的一篇有關翻譯的論文——"Des Tours de Babel"——是選集中的最後一篇論文。這篇論文先以編者的英譯出現，然後才是法文原文。因為德希達的這篇論文在此是第一次正式出現，而緊接在英譯之後的法文是論文在選集中的原來面貌。
- ⁴ 路易士說這個文本是一個法文文本的「自由翻譯」("Vers la traduction abusive") 收錄在 *Les fins de l'homme* [Paris: Galilée,

1981] 253-61)。路易士將上述法文論文的題目譯為「論暴逆的翻譯」(“Toward Abusive Translation”), (“The Measure”, 31, 33)。

⁵ 《翻譯中的差異》(Difference in Translation), 這本書源自於1980年10月美國紐約州賓更姆頓的一場研討會。

⁶ 史碧娃克翻譯的《卓帕第》出現在《批評探討》期刊8, 2 (冬季, 1981) (Critical Inquiry 8, 2 (Winter 1981)), 而後再出現於《書寫及性別差異》(Writing and Sexual Difference, ed. Elizabeth Abel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82))。〈書寫及性別差異亦是《批評探討》期刊專號中的標題。這期亦是由依莉莎白·亞伯所主編。我曾在它處建議《書寫及性別差異》可以讀為德希達的 *L'écriture et la difference* (《從身想起》Thinking Through the Bod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8], 162) 的翻譯。在這個例子中, 所謂「內馴」(domestication) 德希達的文本是很明顯地將其女性化。我對《書寫及性別差異》的解讀(《大約在1981》Around 1981 [New York: Routledge, 1991], 13-20)可說是將其重寫為〈翻譯中的差異〉(“Difference in Translation。)

⁷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In Other Words: Essays in Cultural Politics* (New York: Routledge, 1988)。

⁸ 在我們將讀到的這個段落之後就只剩下一段了。在這一段中我們可以看到德希達文本的啟始部份和史碧娃克的姓名、居所以及重要大事的日期相互交織在一起——這是一個實驗性的段落, 既不是序言也不是正文, 而是兩者的混合物。因此我們可以把即將閱讀到的這一段視為譯者序本身(proper)的結尾, 在這之後, 史碧娃克就將自己與德希達「混為一談」。

⁹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Translator’s Preface” to *Of*

Grammatology by Jacques Derrida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6), lxxxvii.

- ¹⁰ Jacques Derrida, "Plato's Pharmacy" in Dissemination, trans. Barbara Johns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1); 最初被收錄在 *La Dissémination*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1972) 中，篇名為 "La Pharmacie de Platon"。
- ¹¹ Spivak, "French Feminism in an International Frame" in *In Other Worlds: Essays in Cultural Politics* (New York: Routledge, 1988), 138-9。
- ¹² Jacques Derrida, *De la Grammatologie*, 137-8; *Of Grammatology*, 90。

原文出自 *Qui Parle* Vol. 8, No. 1, Fall/Winter 1994。經作者授權中譯。